

1925年上海的二月罷工： 圍繞中國工運史與「政治化」的考察

衛藤安奈

摘 要

本文旨在通過探討1925年上海二月罷工的擴大過程，觀察罷工參與者的主動性與被動性所占的比重，進而分析當時中國工人運動「政治化」的性質。二月罷工大體有三個階段：一是面臨失業危機的工頭走向過激化的階段；二是革命黨的動員工作和他們的革命話語，使得失業工頭的過激行為獲得正當性的階段；三是失業工頭與在他控制下的工人，對上工工人施加威脅與暴力的階段。但是惟有公大紗廠工人對外部的暴力介入展示了一些抵抗。其能夠抵抗的原因，筆者認為，廠方與公大紗廠工人設有的對話平臺「溝通意見委員會」（意志疏通委員會）起了重要作用。

民眾運動的「政治化」其實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前景。第一種「政治化」是具有對話性的活動，將來走向民主主義的可能性較大。另外一種「政治化」，它缺乏對話性，運動參與者中的個人缺少發言權，因此這種「政治化」將來走向獨裁的可能性更大。筆者認為，一個運動並不會只具有走向獨裁或走向民主的單一可能性。為了打破革命話語對我們的拘束，同時也為了避免陷入「愚民觀」式的敘述，首先應該承認某一運動在一開始是處於既非指向民主也非指向獨裁的中間狀態之中。之後，才能仔細探討運動本身，提出更為客觀的結論。

筆者的結論在於，二月罷工的「政治化」從結果來說是缺乏對話性的，因此它的「政治化」是走向獨裁的。儘管如此，公大紗廠的個案表明，也有工人抵抗了二月罷工。這些工人中的對話平臺，賦予了工人一定程度的發言權，在當時曾帶來也許走向民主主義的歷史的可能性。

關鍵字：二月罷工、政治化、對話性、暴力、打廠

A Study of Politicization in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The 1925 February Strike in Shanghai

Anna Eto*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nature of “politicization”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the 1920s by identifying the degree of spontaneity and passivity of work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February Strike, one in a wave of strikes that hit Japanese-owned spinning factories in Shanghai from February 9 to March 2, 1925. The February Strike began as foremen who, having been laid off by factories, turned to radical actions, including attacking factories. Revolutionary party members then mobilized unemployed foremen, giving their radical activities political legitimacy wit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Almost entirely under the control of foremen, unemployed workers used threats and violence towards other workers to get them to support the strike. One interesting exception to this pattern was the case of Gongda, a Japanese-owned cotton mill. Faced with the February Strike actions, the workers of Gongda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 self-defense corps, and resisted outside mobilization. There must have been a complicated variety of reasons, but it is notable that the Gongda factory established an *Ishisotsūinkai* (communication committee) with its workers.

In general terms, there are two contradictory images of “politicization.” The first image is politicization with discussion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is kind of politicization, we can identify a movement toward democracy. In contrast, the second image is extremely negative, showing politicization which excludes discussion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such politicization, the tendency toward

* Part-time Lecturer at Faculty of Global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of Ferris University and at Faculty of Human Sciences of Tokiwa University

dictatorship becomes strengthened. Both images can be found in previous studies, but there are few scholars who try to connect these two “politicizations.” My suggestion in this paper is that we need to start from a more neutral assumption, with a view to preventing our thinking from being limited by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or possessed with Yuminguan (i.e. the view that regards the people as being ignorant masses)--that is to say, we had better see the strikes as a movement initially having two potential outcomes.

A balanced analysis of the February Strike indicates a tendency towards dictatorship, because the strikers generally lacked the ability to engage in discussion or to have a sense of public spirit. Nevertheless, from the case of Gongda, we can see there were also workers who resisted outside mobilization. They had a kind of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rom which they found a degre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February Strike also did include a possibility of democratization.

Keywords: February Strike, politiciz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discussion, violence, *Da chang* (attack on factories)

1925年上海的二月罷工： 圍繞中國工運史與「政治化」的考察*

衛藤安奈**

壹、前言

本文旨在通過探討1925年上海二月罷工（2月9日至3月2日）的擴大過程，並觀察測定罷工參與者的主動性與被動性分別所占的比重，來分析此工人運動的「政治化」的性質。筆者之所以未選擇同年5月發生的五卅事件及之後擴大化的五卅運動，而選擇在後人看來影響較小的二月罷工，其理由為，在日本人士留下的記錄中，二月罷工是第一次被明確理解為「過激化」的罷工。

討論「政治化」（politicization）及其類似概念「過激化」（radicalism）的時候，人們往往對這兩個概念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印象。一種認為，「政治化」是人們因相信能改善或解決政治或社會問題而主動參與政治活動的現象，這種「政治化」的消極含義較少，而更可能把參加者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甚至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13年3月「第一屆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與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工作坊」。筆者謹向舉辦此次工作坊的師長表示感謝，尤其是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鍾延麟老師熱情地提出不少問題。在論文補充修改的過程中，筆者很難說已經完全解決了師長提出的這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確實進一步深化了筆者對這篇論文主旨的思考。此外，筆者很榮幸得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力教授的指導。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感謝。

收稿日期：2013年10月5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年12月5日。

**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科（法學）博士；Ferris女學院大學國際交流學部兼任講師兼常磐大學人間科學部兼任講師

可以說，這種「政治化」常常被當作是走向民主主義，被認為是可以醞釀出「自治」。¹ 還有一種「政治化」則含義極端消極，是指某些問題或行動主體被政治所利用的現象，那些受到政治利用的人，被視為是弱者或犧牲者，他們幾乎失去了主動性。²

如何理解「過激化」，取決於如何評估「政治化」的本質。在法國與美國，革命史或民衆運動史中使用的radicalism，可以說是積極含義的politicization的下位概念，係指堅持追求公平政治的態度。比如，法國歷史學者Jean Chesneaux所使用的political struggle等詞語，和美國歷史學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使用的radicalism幾乎是一個意思。³ 這種「過激化」雖然對所謂資本家、帝國主義者等「敵人」展示激烈的態度，但是決不會失去對話性。因為在任何情況下，最高的價值儼然在於個人的自由，誰都有發言權。⁴

然而革命黨的革命話語，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強調民衆情緒的一致性。要求一致性難免排斥意見的多樣性，但革命話語同時也主張所有工人的主動性，因此革命話語不得不掩蓋反對者的存在。

與上相反，關注黨與黨或者領導人間等各個層面的派別鬥爭的學者，常常提到與上面的「政治化」較為不同的「政治化」。比如蔣永敬、胡春惠、呂芳上、

¹ 我們可以在圍繞所謂市民社會與公共圈形成的研究中，找到很多與「自治」概念關聯密切的「政治化」的例子。

² 比如，日本的政治學者高島通敏在政治學入門書中指出，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年輕人對政治的印象「極端不好」，這種心理與他們對政治漠不關心的傾向有直接聯繫。高島還把日本的一般民衆如何獲得「自治的政治觀」看作是今後日本社會的課題。高島通敏，《政治学への道案内》（東京：講談社學術文庫，2012年），頁38-51、53。

³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⁴ 關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圍繞勞工運動的話語，請參見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1930年6月19日），收入編者不明，《鄧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中國勞工運動史（一）》（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年）。近年來臺灣出版的通史著作，有以下幾種在其關於勞工運動的敘述中，採用革命話語：蘇啟明，《中國現代史》（臺北：五南書局，2002年），頁79-80；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2014年），頁315-318；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2版），頁145-146。

馮筱才等人的研究所指出的「政治化」，主要是缺乏對話性的「政治化」。⁵ 這些文獻都強調革命黨的動員效果。結果，運動中的民衆被描述成只是被動員的人群。這種「政治化」將會導致獨裁制。筆者認為，可能如何把radicalism用亞洲語言來翻譯，此問題本身就不簡單。⁶ 但是，一旦拋卻西方政治哲學中的核心價值，也就是個人的自由，「過激化」容易轉成爲對敵人的單純暴力。

如果要問哪些「政治化」好？可能很少會有人主張走向獨裁制的「政治化」是最好的。不過，實際上這兩種「政治化」都是人們與政治領域產生接觸時的狀態，不僅表面上很相似，在現實中也常常交織在一起，很難分清楚。因此，討論兩種「政治化」的先行研究，似乎彼此忽略了或者未曾意識到對方所說的「政治化」的重點在哪裏，從而導致雙方分析的對話不夠，而是簡單地認爲民衆運動要麼走向積極意義上的「政治化」，要麼走向消極意義上的「政治化」。

比如，受到1960年代的社會運動理論（social movement theory）影響的歐美研究者，不論是用politicization，還是用radicalism，都是在積極的語境中進行討論。社會運動理論在反戰運動等的影響下獲得發展，因爲有這種背景，它對人們的結盟或團結寄予了一種期望。它主要關注國家或者社會主流的暴力，重視如何進行反對性的抗議活動，卻缺乏對出現在社會內部，尤其小團體內潛在暴力的考察。裴宜理等以往的研究帶有濃厚的社會運動理論色彩，這是因爲美國的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是在美國歷史界的「新勞工史」（New labor history）學派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⁷ 而創建「新勞工史」學派的美國學者，則是對反戰運動具有強烈

⁵ 關於這點，參照這些研究的論調。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3年）；胡春惠，〈北伐前後的民衆運動〉，收入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第4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頁559-613；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馮筱才，《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1924-19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

⁶ 比如，劉平把裴宜理的radicalism翻譯成激進主義。在日本，它常常被翻譯成「過激主義」、「急進主義」等。不過，radical原來的意思是「根」、「原則」，應該有別於單純的「激進」。關於其中文翻譯，筆者還參考了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⁷ Alain Roux,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by Elizabeth J. Perr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y 1994), p. 226.

共鳴的一代。⁸ 因此，「新勞工史」學派的美國學者，常常把兩種「政治化」混淆，並且根據自己的信念，將最後的敘述導引到讓自己滿意的結論上來。⁹ 在這些研究中，中國民眾被賦予了過度的主動性與發言權。

而在日本，1990年代之後，很多研究者已意識到革命話語所主張的「政治化」，與中國民眾運動史的現實的「政治化」之間有相當大的差距。但是很少有人進一步分析兩種「政治化」的關係。可以說，迄今為止，關於這問題日本學界還處在一種停止思考的狀態。在中國大陸，「政治化」的詞彙用法，除了革命史的敘述以外，也是很消極的。¹⁰ 在臺灣，特別是受到國民黨革命話語影響的先行研究，很早就將運動陷入混亂的責任歸於共產黨的動員。¹¹ 這樣的解釋雖然很具有說服力，但是如果一味強調共產黨的動員，參與其中的民眾就難免好像是自己不能思考的動物一樣，因此研究者容易陷入一種愚民觀，還會有把積極參加者的

⁸ 關於這點，參照篠田徹的整理及裴宜理的回憶。篠田徹，〈よみがえれ 労働運動〉，收入山口定等編，《2025年日本の構想》（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頁236-261；篠田徹，〈労働運動について考える〉，《労働調査》（2009年1月），頁48-62；Elizabeth J. Perry, "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1147-1148.

⁹ 例如，裴宜理的《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一書，就可以看到這種傾向。裴宜理始終強調，工人之間鞏固的傳統紐帶雖然一方面導致了工人分裂，另一方面起了讓工人走向「radicalism」的作用，因此推斷工人足以成為影響中國政治方向的社會力量。她的著作充滿了這種期待，間接地支持中國社會走向民主主義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冷靜地閱讀相關史料，研究者不得不承認裴宜理的結論過於樂觀。有這種讀後感的並不是筆者一人，例如Michael Tsang-woon Tsin也有類似的看法。見Michael Tsang-woon Tsin,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Canton 1900-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3.

¹⁰ 上海復旦大學的張建偉所發表的〈逃避《政治化》到底在逃避什麼〉一文，簡潔概括了中國知識分子在兩種「政治化」之間的苦惱。他指出：「『政治』一詞在中國被賦予了太多敏感色彩，一提到政治，大多中國人腦子裏的第一反應就是權力爭鬥，這就使某些掌權者不願意將某些公共事件納入政治範疇，有意逃避政治化。其實，現代政治早已不是私人之間的權力爭鬥，而是不同利益群體進行利益博弈，來化解利益衝突的舞臺。政治一詞在當今中國之所以具有敏感性，與權利的私有化傾向有關，權力往往被看成是掌權者個人的私有所屬物，由於害怕失去權力，他們就會將本屬於政治領域的利益矛盾問題排除政治，由此造成了權力公共性的萎縮。」張建偉，〈逃避《政治化》到底在逃避什麼〉，《聯合早報》，新加坡，2012年2月2日，轉引自「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2012/0202/52932.html>（2013/6/20點閱）。

¹¹ 參照以馬超俊等為主的國民黨勞工運動領袖的敘述。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中國勞工運動史》。

動機簡單化的風險。

筆者認為，我們不能認為某運動僅具有走向獨裁或者走向民主的一種可能性。爲了打破革命話語的拘束，同時也爲了避免陷入愚民觀的敘述方式，先假設某一運動是處於既非指向民主也非指向獨裁的狀態比較保險。之後，通過對運動本身的仔細探討，才能獲致更為客觀的結論。

貳、日本人士對二月罷工的評價

當時日本人記錄下來的二月罷工印象，是消極的「政治化」與「過激化」。日本人認為此次罷工的性質與過去的罷工完全不同，它異常過激，擴大得更廣泛，持續的時間更長。據滿鐵資料分析，紡織工廠主、租界工部局和中方有關人員，最初都把二月罷工視爲「普通」的罷工事件，以致低估了此次罷工的嚴重性。「（他們）都預想，罷工團很快就會面臨生活問題，所以到了最後的階段就不得不讓步。」¹² 但是二月罷工的擴大，出乎了他們的預料，它不僅長期持續，而且勢頭愈益猛烈了。《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2月28日的社論指出：「此次罷工與普通的罷工很不同，以致於任何人也未能正確地說明罷工發生的原因。」¹³ 據滿鐵資料的記載，罷工工人的抗議方式比以前「惡化」了，「直接行爲」增多了。¹⁴ 《滿洲日日新聞》報導：「他們的行爲偏向於過激，或搗毀機械，或嚴重毆傷我國職員，幾乎轉爲暴動，（人們）不能把它看作『普通』的罷工。由於其性質被認爲很嚴重，此次罷工喚起了社會一般人士以及業界有關人員的關心和研究。」¹⁵

¹² 高久肇編纂，《滿鐵調查資料第49編》（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5年），頁11。

¹³ 高久肇編纂，《滿鐵調查資料第49編》，頁14。

¹⁴ 高久肇編纂，《滿鐵調查資料第52編：最近上海に於ける労働運動風潮》（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6年），頁16。

¹⁵ 〈在滿の工業家以て他山の石とせよ（一～五）：上海紡績罷業真相〉，《滿洲日日新聞》，大連，1925年3月31日、4月5日，收錄於「神戸大学附属図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Kobe University Library Digital Archive）：新聞記事文庫（Newspaper Clippings Collection）」：<http://www.lib.kobe-u.ac.jp/sinbun/>（2013/6/26點閱）。直接聯結到引用資料的網址頗長，因此筆者只表示該數據庫首頁網址。

之後，內藤隈南依據日方資料在《在支那紡績爭議》（1925年）一書中概括說：紡織工人的組織是以傳統祕密結社方式建立的，因此難免淪為「極端專制的組織」，雖然其「首領」是靠「衆望」選出來的，但一旦當選，一般成員就不得不服從他的命令。要不要實行罷工，完全取決於「首領」的面子。¹⁶ 其實，1923年刊登在《大阪每日新聞》上的〈支那紡績勞動的現狀〉（支那紡績労働の現狀）一文，也指出了中國紡織工人的被動性。根據這篇文章的介紹，中國紡織工人「有很強的附和性」、「儘管沒有自己的看法與理由，如果有勢力的職工開始某個行爲，紡織工人馬上就跟隨他。」¹⁷ 在日方有關人士的認識中占主流的，是強調紡織工人的被動性的言論。

總的來說，強調民衆運動的被動性是當時日本相關言論的一個特徵，不過這些評價也反映了當時的一些社會現實。下面將試圖分清紡織工人群體中主動性與被動性的界限。

叁、面臨失業危機的工頭之過激化

在共產黨的政治話語中，二月初旬的女工虐待事件，是二月罷工發生的主要原因。但如果細讀有關此一事件的詳細史料，可以發現引發二月罷工的原因其實有兩個。一是日本人監工虐待女工的行爲，另一則是內外棉八廠粗紡部的男工被解雇事件。最典型的解釋結合了這兩個原因：內外棉八廠粗紡部的男工看到日本人監工虐待年少的女工，抱有不平，因義憤而抗議監工，結果遭了解雇，所以他們發動了二月罷工。¹⁸

¹⁶ 內藤隈南，《在支那紡績爭議》（東京：東亞社出版部，1925年），頁65。

¹⁷ 堅田生，〈支那紡績労働の現狀（上）〉，《大阪每日新聞》，大阪，1923年8月19日，收錄於「神戸大学附属図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新聞記事文庫」：<http://www.lib.kobe-u.ac.jp/sinbun/>（2013/6/26點閱）。

¹⁸ 不過筆者推測，最先試圖開始罷工的工人也許不是內外棉的工人，而是同興紗廠工人。據劉貫之（前同興紗廠工人）的回憶，30多名同興紗廠工人於1925年2月1日被開除，此時罷工已經開始了，「劉貫之把同興紗廠上述情況報告滬西工友俱樂部負責同志項英、劉華等，隨即大家進行研究。」劉貫之，〈關於1924年-1925年上海工人運動的回憶〉，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第1-8期（下）（北京：工人

這樣的解釋依據的是罷工當事者的說明，自然只反映了罷工工人和黨的立場。¹⁹ 需要考慮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民國時期的工人抗議是爲了爭取或是保護自己的工作權而發起的，二月罷工也不例外。

不過，筆者在此次罷工發生的過程中，還發現男工與女工之間潛在的對立關係。²⁰ 事實上，早在1925年1月初旬，內外棉已開始以女工取代男工，²¹ 這導致了「男工之恐慌」。²² 不僅如此，當時的日資紡織工廠還認爲工頭制度有很多弊端，²³ 因而試圖改革勞務管理制度，具體作法就是把工頭制度改爲直接管理制

出版社，1984年），頁96。而滬西工友俱樂部的傳單所記載的是2月2日內外棉八廠粗紡部的男工被解雇的事。宇高寧，《支那勞働問題》（上海：國際文化研究會，1925年），頁637-638。可能對黨員來說，內外棉八廠裏發生的女工受虐事件，比同興紗廠男工被開除的事件更有利於宣傳資本家的暴虐行爲。因此當時的黨員力圖把女工虐待事件和內外棉八廠男工被解雇的事件結合起來，集中於動員內外棉的工人。

¹⁹ 邵力子（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的主筆）和劉貫之（滬西工友俱樂部的成員）說明了解雇男工的原因：1925年2月2日，在內外棉八工廠很長時間從事夜班的女工因打瞌睡而被日籍監工毆打。女工的姐姐出面勸架，監工竟也毆打其姐。男工們同情被毆打的女工，發動怠工，結果也被解雇。因此男工們開始罷工。除此之外，邵力子還說明，出自於對少女的同情而發動的抗議，自然地變成要求加薪的藉口。〈日紗廠罷工尚在調解中〉，《申報》，上海，1925年2月23日，版14；〈支那有力者の見たる日本人紡績罷業の原因〉，（報紙名不詳），1925年5月10日，收錄於「神戸大学附属図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新聞記事文庫」：<http://www.lib.kobe-u.ac.jp/sinbun/>（2013/6/26點閱）。

²⁰ 雖然滬西工友俱樂部也有女工，但基本上由男工運作滬西工友俱樂部。早期探討紡織工廠的女工運動的女性研究者，較早注重男工與女工之間的潛在對立關係。佐藤明子，〈五・三〇運動における中國婦人〉，《史海》，第27號（1980年），頁28；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5.

²¹ 日刊支那事情社編（本多英三郎發行編輯），《長江流域の労働運動》（東京：日刊支那事情社，1927年），頁73-74。

²² 宇高寧，《支那勞働問題》，頁596。

²³ 據滿鐵資料的記載，由工頭來招募工人的方法，經常使工廠雇用同一地方的工人，廠方認爲這樣的招募方法有很多「弊端」。這篇文章裏沒有具體說明有哪些弊端。但以地緣關係（地方幫）為單位而分裂的工人之間的糾紛，有可能是其中之一。1939年出版的《支那常識讀本》中有如下的說明：外國人雇用中國人之際，「需要盡量雇用各地的出身者，巧妙地分散其勢力」。再加上廠方認爲，由工頭雇用的工人，工作效率不太好。高久肇編纂，《滿鐵調查資料第52編：最近上海に於ける労働運動風潮》，頁101；山口梧郎，《支那常識讀本》（東京：テンセン社，1939年），頁147。

度（直轄制），²⁴ 這樣的嘗試實際上意味著工頭的失業。

發動二月罷工的核心團體滬西工友俱樂部，是由共產黨成立的，它首先吸收的就是被開除的工頭，如同興紡織和內外棉廠的失業工頭。滬西工友俱樂部的負責人之一孫良惠，原是住在同興紡織宿舍的「工人頭」（即工頭），²⁵ 根據共黨黨員嵇直的回憶，他在加入滬西工友俱樂部時已經失業。²⁶

1924年底，孫良惠訪問內外棉第五工廠粗紡部的工頭顧汝舫，他向顧勸誘說：「（滬西工友俱樂部）免費教工人讀書、看報，還可以練武術。」此後，顧汝舫與俱樂部負責人之一劉華見面時，「我曾聽到俱樂部不要拿摩溫（引用者註：拿摩溫是No.1的音譯，指工頭）的說法，我就問劉華是否這樣？劉華說，這話也對也不對。……如果是肯幫工人做事的拿摩溫，肯站在工人方面的，我們當然還是要的。」顧汝舫說：「我聽了很高興，就這樣加入了俱樂部。以後，我還發動了不少工人加入俱樂部。」²⁷ 可見，滬西工友俱樂部活躍起來主要還是通過工頭間的互相召集。但是，由於在共產黨的革命話語中，是把工頭當作黨和工人的階級敵人的，所以嵇直在他的回憶中特意補充說：「至於孫良惠，據我的了解，他確實是個工人。」²⁸ 嵇直的解釋也不能算是虛假，因為客觀來說，這一時

²⁴ 在先行研究中，韓起瀾（Emily Honig）、岡部利良、高綱博文及江田憲治等已指出撤銷工頭制度產生的影響。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p. 7；岡部利良，《旧中国の紡績労働研究》（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1992年），頁262-264；高綱博文，〈上海『在華紡』争議と五・三〇運動——顧正紅事件をめぐる〉，收入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民国前期中国と東アジアの変動》（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1999年），頁486-487；江田憲治，〈第2章 在華紡と労働運動〉，收入森時彦編，《在華紡と中国社会》（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5年），頁43。

²⁵ 宇高寧，《支那労働問題》，頁699。

²⁶ 嵇直，〈關於上海小沙渡滬西工友俱樂部成立經過的回憶〉，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85。不過，再據《民國日報》1921年11月29日的報導，孫良惠曾經以「紡織工會」代表的身分積極活動。孫良惠被開除，有可能和他當時的活動有關。《民國日報》（1921年11月29日），收入劉明遠等主編，《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第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頁65。

²⁷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訪問，顧汝舫記錄，〈顧汝舫關於滬西工友俱樂部的回憶〉，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頁293-294。

²⁸ 嵇直，〈關於上海小沙渡滬西工友俱樂部成立經過的回憶〉，頁284。

期工頭和工人的界限本來也很模糊。

如果二月罷工真的是基於男工的利害關係而發動的，就不難理解女工對罷工採取較為消極的態度了。嵇直還提到，在二月罷工之前，共產黨能聯絡的內外棉工廠工人「僅僅限於男工」。他坦率地寫道：「與為數眾多的女工，則連一個也沒有接觸過。」²⁹ 而當時，紡織工廠裏的男女比率，則是「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女工」。³⁰ 共青團上海區委也報告，至少在二月罷工的後期階段，女工是願意復工的。³¹

筆者並不否認日本人監工毆打女工的事件對罷工帶來的影響，但是此一事件不過是導火線。此前內外棉開始開除男工及工頭，才是男工的不滿充分醞釀的主因。

肆、黨的介入與政治話語的作用

民國時期，工人一旦面臨被解雇的危機，一般會直接導致被開除工人與新受僱者之間的糾紛，甚至引發工人集團之間的武裝衝突，即械鬥。紡織工廠的工人也不例外。比如，1919年10月，位於浦東地區的日華紡織一工廠精紡部，由於雇用新男工而招致被開除男工的騷擾。該工廠精紡部的男工（應該是工頭），首先「煽動其他的頭目」，然後在路上毆打新來的工人，接著「責備（引用者註：雇傭新男工的）職員」，用木棍毆打這個職員。³² 1925年二月罷工剛結束後，也發生了內外棉三工廠的女工頭與男工頭之間的糾紛，最後事態發展成為男工團體的破壞行爲。³³

²⁹ 嵇直，〈關於上海小沙渡滬西工友俱樂部成立經過的回憶〉，頁286。

³⁰ 宇高寧，〈支那勞働問題〉，頁596。

³¹ 〈共青團上海地委關於小沙渡楊樹浦日商紗廠工人同盟罷工經過情形的報告〉（1925年3月26日），收入上海市檔案館編，〈五卅運動〉，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5。

³² 宇高寧，〈支那勞働問題〉，頁537。

³³ 據《警務日報》1925年3月4日的記載，在內外棉三工廠裏有青年工人遭到女工頭的責罵，這名工人雖向男工頭訴說了他的不滿，但未能達到令其滿意的結果，因此男工團體搗毀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二月罷工之際，女工雖然是奪取男工工作機會的競爭者，可是男工並沒有對女工全面地發洩敵意。在一般情況下，可以料想男工會直接攻擊女工，不過黨的介入，尤其是黨所帶來的政治話語，卻使男工對現實的認識有所改變。男工接觸了「引進養成工說」（養成工導入說）之後，其不滿與敵意轉變為對所謂「資本家」的敵意。

「引進養成工說」是解釋工廠開除男工理由的一種說明模式。它主張：工廠陰謀用自己馴養的奴隸工人即「養成工」，來代替勇敢抗議的男工。在工廠方面的言論中，確實常常出現要開除「不良」男工、「代而招募女工」等說法，這樣的解釋符合一定程度的事實。可是「引進養成工說」只強調工廠懷有「陰謀」的一面，卻故意不談及「養成工」的意圖。江田憲治仔細探討了「養成工制度」，他指出「養成工制度」本來的主旨是在正式雇用之前，設置 1-3 個月左右的實習期，並非是像當時革命人士所說的那樣要長期馴養工人的制度。³⁴「養成工制度」與開除工頭，確實都是內外棉廠改革勞務管理制度計畫的一環，但在正式雇用之前設置實習期的措施，與開除工頭之間不一定有直接關係。儘管如此，黨的政治話語斷言，工廠是爲了有計劃地開除男工（在黨的政治話裏絕對沒有使用工頭這個詞彙），而引進「養成工制度」。

黨的宣傳活動成功地把兩個問題結合起來，也把養成奴隸制度的形象聯繫在「養成工制度」之上。宇高寧的著作《支那勞働問題》，記載了當時日本人入手的 16 張傳單（都被翻譯成日文）。按原書排列次序，第九張的傳單裏才能發現「引進養成工說」的原型。在這張傳單中，「養成工」明顯是指女工。因為有的傳單沒寫日期，原書的排列次序不一定正確地反映了傳單發行的順序，不過可以推測第九張傳單至少是在二月罷工急速擴大之後才散布的，因爲這張傳單有 7 個日資紡織工廠工人的形象，可以推斷它是在 7 個工廠遭遇「打廠」，工人罷工之後發布的。³⁵

工廠的器械與電氣設備。《警務日報》，1925年3月4日，收入上海市檔案館編，《五卅運動》，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4。

³⁴ 江田憲治，〈第2章 在華紡と勞働運動〉，頁37。

³⁵ 第九張傳單的原文如下：如內外棉工廠，把一班女工叫做養成工，給她們奴隸的教育，女工的技術熟練起來就以之代男工，開除原來雇用的男工。使如斯馴養的女工永遠低下

不久，「引進養成工說」透過上海媒體，尤其是與革命黨有關的報紙更為普及了。按照江田憲治的整理，1925年2月12日「引進養成工說」出現在國民黨的報紙《民國日報》上，接著於14日刊登在共產黨的雜誌《嚮導》上。然後17日在商業報紙《申報》上也出現了。³⁶ 其中，《申報》報導如下：「查此次罷工係發動於小沙渡內外棉紗廠之第五第七第八第十二四廠，於九日下午四時開始，人數僅九千餘人，其發動原因遠因為本月二日第八廠開除工人四十餘人以養成工代替之。」³⁷

對支持二月罷工的男工來說，「養成工」的形象幾乎等同於女工。把女工當作被日本人馴養的奴隸的政治話語，使男工對女工的態度比以前更加複雜了。他們一方面同情被日本人虐待的可憐的女工，另一方面更是歧視地認為女工是處於奴隸地位的愚蠢工人。在「打廠」（下述）過程中，男工威脅女工的事很常見，這與「引進養成工說」的形成有關係。

缺少政治話語，任何民眾運動都難以發生。1960年代的反戰運動之後發展起來的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的理論指出，若是僅有不滿，而沒有正確的把握現實，並提出解決辦法的話語框架，不滿就不一定能有效地形成為運動。³⁸ 二月罷工的時候，黨的介入帶來新的解釋、新的政治話語。這使得被開除的工人更有活力，使他們的不滿轉化為一股能推動整個社會的力量。筆者認為，如果只注重二月罷工參加者維護利益的行為，而不去注意政治話語與暴力結合的一面，這只能給列寧所提的「前衛」概念增添一些正當性，抑或提供一些論據而已。因此下面將具體分析革命黨的政治話語與暴力結合所帶來的結果。

頭，榨她們的血汗，為自己賺錢，換言之，這是製造奴隸所。其中，能爭氣的男工都被開除。字高寧，《支那勞働問題》，頁652。上海市檔案館編的《五卅運動》第1輯（頁335-341）也轉載該書所收錄的一部分傳單，重新把它翻譯成中文，但是未收錄第九張傳單。

³⁶ 江田憲治，〈第2章 在華紡と勞働運動〉，頁37。

³⁷ 〈日商紗廠罷工潮之昨訊〉，《申報》，上海，1925年2月18日，版13。

³⁸ 按照社會運動的理論，人們面臨某個社會問題的時候，有了為群眾解釋應如何解決問題的框架，運動就會發生。關於這點，參見圍繞解釋框架（Framing）和集體行為的討論。Sidney G.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Revised and updated 3r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1-32, 144-146.

伍、罷工工人對上工工人的威脅與暴力

裴宜理曾指出，二月罷工的動員工作中，內外棉三工廠的工頭陶靜軒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³⁹ 陶靜軒是湖北人，曾當過軍閥的傭兵，之後來到上海當碼頭工人，通過湖北幫進入內外棉十五工廠當了揩車工。據《湖北省志·人物》介紹，他在滬西工友俱樂部中任交際委員，後來成為委員長。⁴⁰ 《上海英烈傳》指出，陶靜軒「利用揩車工頭的身分，有目的地結識各幫派帶頭人」。此篇文章所指的幫派，是指控制內外棉工人的五大同鄉團體，即：安徽幫、湖北幫、蘇北幫、山東幫和紹興幫。五大幫的「帶頭人」（應該是工頭）用青幫式的儀式結拜為兄弟。⁴¹ 當時，大部分的上海工頭是青幫的成員，因此裴宜理把五卅運動的本質，概括為建立在共產黨與黑社會的「困難且脆弱的同盟」（an uneasy and fragile alliance）基礎之上的產物。⁴² 而且碼頭工人的日常生活與黑社會的關係比其他工人更密切，有可能陶靜軒是通過青幫關係，來聯絡其他的工頭進行動員工作的。

陶靜軒得到了內外棉「帶頭人」的同意之後，為了使罷工擴大，他採取了「打廠」戰略。據劉貫之的說法，「打廠」是最有效推動二月罷工的戰略。⁴³

按照革命史的敘述，「打廠」指已罷工的工人支援別廠工人的罷工。⁴⁴ 但客

³⁹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p. 78.

⁴⁰ 張義漁等編，《上海英烈傳》，第1卷（上海：百家出版社，1987年），頁72-73；上海第二紡織機械廠廠史編寫組，〈陶靜軒烈士簡介〉，收入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辦公室編，《上海工運史料》，1987年第3期（1987年5月），頁36-37；上海紡織工人運動史編寫組，《上海紡織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頁570-571；馮天瑜主編，《湖北省誌·人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85。

⁴¹ 張義漁等編，《上海英烈傳》，第1卷，頁73-74；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p. 78.

⁴² 張義漁等編，《上海英烈傳》，第1卷，頁73-74；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p. 84.

⁴³ 劉貫之寫道：「幾天之後，看到內外棉三廠實行『打廠罷工』，並且組成了工會，各廠的工友更加迫切地要求學習內外棉三廠的榜樣，及時行動起來。果然，工潮迅速擴大了……『打廠罷工』這個方法，成了當時的風氣。」劉貫之，〈關於1924年-1925年上海工人運動的回憶〉，頁103。

⁴⁴ 關於「打廠」，中共黨史出版社的《上海紡織工人運動史》簡單地進行了說明：紗廠工人

觀來說，「打廠」是用武力襲擊工廠，這可能是陶靜軒據自身「打碼頭」⁴⁵的經驗而形成的。「打廠」的大略程序如下：策劃罷工的工人夜間襲擊工廠，搗毀機械，宣言罷工，把上班中的工人趕出工廠。對於不願意罷工的工人，則不惜使用武力。最後在外面開會，宣言工會之成立。

下面，筆者參考各種日文文獻（大多是根據紡織工廠方面的報告而寫成的）、上海市檔案館編輯的《五卅運動》（第二輯）所收錄的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的《警務日報》，以及當時的報紙，嘗試整理「打廠」的過程。

二月罷工首先於2月10日從內外棉五東廠開始。內藤隈南指出，「煽動團」（即是以滬西工友俱樂部為主的罷工團）呼籲工人罷工，但是起初內外棉的其他工廠裏沒有人響應，因而以五東廠工人為主的男工，協同「局外的無賴漢」襲擊了九、十三、十四工廠。據內藤隈南與《警務日報》的記載，襲擊者在搗毀工廠與辦公室的設備後進入工廠，又搗毀電燈、機械等設備。試圖制止的人或是未及時逃脫的「日本職員以及職工」、「日籍、華籍工人」也被襲擊，有人受了輕傷或重傷。⁴⁶

2月13日晚上12點，滬西工友俱樂部的工人襲擊了日華紡織三、四廠。分別有20-30名工人蜂擁而入各工廠，大聲叫嚷着並關停機械，要求「驚慌失措而亂跑」的女工罷工。⁴⁷

支援別廠罷工的俗稱。上海紡織工人運動史編寫組，《上海紡織工人運動史》，頁64，註釋2。傅道慧的《五卅運動》進一步寫道：「『打廠』是上海工人發動別廠罷工的一種鬥爭方式。即此廠罷工，別廠工人本欲響應，因受資本家控制甚嚴。一時罷不下來，已罷工廠的工人組成隊伍，到未罷工廠外面大喊罷工，或衝入廠內，這樣藉外廠之力突破控制，稱為『打廠』」。傅道慧，《五卅運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49，註釋2。

⁴⁵ 為了爭取工作權，民國時期的碼頭工人常常襲擊其它碼頭工人的地盤，這樣的碼頭工人的械鬥被稱為「打碼頭」。關於民國時期碼頭工人的生活史，參見黎霞與易江波的著作。黎霞，《負荷人生：民國時期武漢碼頭工人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易江波，《近代中國城市：江湖社會糾紛解決模式 聚焦於漢口碼頭的考察》（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

⁴⁶ 內藤隈南，《在支那紡績爭議》，頁111-112；上海市檔案館編，《五卅運動》，第2輯，頁3。

⁴⁷ 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編，《五卅事件調查書：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上海：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1925年），第2輯，頁23。

2月15日晚上7點半，豐田紡織工廠遭到襲擊。警笛響了，30名（《在支那紡績爭議》記載）或者5、60名（《大阪朝日新聞》記載）翻過圍牆進入工廠，放火、搗毀，然後要求夜班工人罷工。據《大阪朝日新聞》的報導，襲擊者威脅很多女工，並將她們趕出門外。⁴⁸ 此次襲擊造成了最嚴重的後果，趕往現場的幾名日籍職員在途中遭到工人襲擊，三好靜一郎被槍擊中，原田與惣次被投入蘇州河。原田因感染病原菌而於數日後死亡。⁴⁹

內藤認為，豐田紡織工廠本來是和當地人關係最好的工廠，因為該工廠位於租界外，得不到租界警察的保護，工廠方面不得不重視與當地人的交流。⁵⁰ 當然，這樣的解釋基本上是依據廠方的辯護而寫的，筆者不能把他的說法看成全面事實。儘管如此，還是可以認為，並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樂於參加罷工，至少豐田紡織工廠的工人重視的是控制和管理他們的工頭的意向。對於二月罷工，工人本身並沒有發言權。其理由是，後來豐田紡織工廠的工人在他們的領袖（都是滬西工友俱樂部的成員）逃走後，都脫離滬西工友俱樂部復業了。而且據記載，直到五卅事件的發生，工人再次受外部的罷工要求為止，「職工的工作態度比罷工前好多了」。⁵¹

豐田紡織工廠的領袖之所以逃走，是因為豐田紡織工廠襲擊事件的後果很嚴重，本來對二月罷工採取漠視態度的上海警察（淞滬警察廳），開始比較嚴格地取締罷工帶頭人。⁵²

⁴⁸ 內藤隈南，《在支那紡績爭議》，頁118；〈上海罷業事件/上海の罷工暴動/上海の罷業暴動/上海罷工事件〉，《大阪朝日新聞》，大阪，1925年2月17日、3月1日。關於襲擊者，矢田總領事報告中也有「無賴之徒約十名與一群不良工人」的說法。〈日本駐滬總領事矢田向外相幣原呈報上海日商紗廠二月罷工的經過〉（出處不明）（1925年5月21日），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頁360。

⁴⁹ 稻葉勝三口述，桑原哲也訪談，富澤芳亞校訂，〈在華紡勤務27年の回顧—稻葉勝三氏（豐田紡織廠）インタビュー—1974年8月19日 頤和園（中日ビル、名古屋）にて〉，《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33号（2011年3月），頁14-15。

⁵⁰ 據內藤的說法，豐田紡織工廠「努力溝通與村長以及村民，結果得到村民的熱心同情和保護，（該廠）應該感到自豪的是5月30以後使上海全市陷入不穩定狀態的此次騷擾（指五卅事件——引用者註）中，也能照常工作到6月15日」。內藤隈南，《在支那紡績爭議》，頁118。

⁵¹ 宇高寧，《支那労働問題》，頁667-700。

⁵² 據矢田總領事致幣原外務大臣的函件，淞滬警察廳廳長常之英在2月15日的豐田紡織工廠

2月16日晚1點，同興紡織一工廠粗紡部的10名男工開始罷工，並要求女工也罷工。日籍職員在食堂召集男工，問他們有哪些想法，但沒有人回答。職員於是換個辦法，把個別男工叫到辦公室，再次確認每個人的想法如何，這一次全體男工都表示願意繼續工作。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交班時間，日華紡織與內外棉的罷工工人來到同興工廠，阻止夜班工人進入工廠。⁵³

以上的記述主要依據日本人撰寫的文獻，客觀的認識還需要不同立場的文獻。⁵⁴ 已公開的共產黨的文獻裏談及「打廠」的負面報告不多，不過有一份共青團上海地區委員會的報告（1925年3月26日）中卻寫道：「（滬西工友俱樂部的成員）對於此次罷工煽動頗為有力，他們這般人，有的在廠中向工人散布罷工的傳單，有的在廠中用武力迫脅廠中工人停工。」⁵⁵ 另外還可以從鄧中夏的文章裏了解到：「見到日本資本家最恐懼的是怕打壞廠中機器，於是工人又衝著這個弱點猛攻……搗毀一些機器，以為暴力的示威，其後工人領袖暗中雖極力制止群眾不繼續『打廠』政策，而在外仍然擴大並普遍『打廠』的宣傳。」⁵⁶ 從以上記載至少可以看出，共產黨領導人應該充分了解到「打廠」的暴力性，和有了暴力才能發揮動員效果這一事實。

二月罷工中，最積極的參與者是被開除的工頭。在他們控制下的男工也比較積極，因為工頭的失業，意味著男工也會失去工作。儘管如此，同興紡織一廠粗紡部的10名男工的故事還需要慎重地探討。他們與同事在一起的時候，要求女工罷工，但是他們個別在辦公室的時候，卻希望繼續工作。也許當時監工威脅個別的男工，男工怕一個人對付不了雇主。但也不能否認男工在二月的罷工風暴中，

襲擊事件後，「開始知事態甚為棘手」。〈日本駐滬總領事矢田向外相幣原呈報上海日商紗廠二月罷工的經過〉（出處不明）（1925年5月21日），頁367。

⁵³ 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編，《五卅事件調查書：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2輯，頁26-27。

⁵⁴ 中村隆英和高綱博文指出，日本紡織企業做出了把二月罷工作為「暴動」處理以逃避責任的姿態。因而，他們試圖強調二月罷工的「暴動」的一面。中村隆英，〈五·三〇事件と在華紡〉，《近代中国研究》，第6輯（1964年），頁148-149；高綱博文，〈上海『在華紡』争議と五·三〇運動——顧正紅事件をめぐる〉，頁498-502。

⁵⁵ 上海市檔案館編，《五卅運動》，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

⁵⁶ 鄧中夏，〈上海日本紗廠罷工中所得來的經驗〉（原載於《中國工人》1925年4月），《鄧中夏文集》，頁113。

也有可能只是為了保護自己而跟從同興紡織的工頭和同事們。否則，工頭與同事們的矛頭，必然會轉向不同意罷工的自己。關於上工中的紡織工人，他們（她們）當時面臨著罷工者的攻擊，由此可以判斷至少在一開始，大部分的人是被动參加罷工的。

資本家對於二月罷工，則得出了工人因受到外部威脅而不得不罷工的結論。⁵⁷ 對於這個結論，雖然我們不能囫圇吞棗，但還是需要認識到其中包含了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如王奇生的研究指出，五卅運動以後，所謂的「五卅惡習」變得常見了，「工人領袖」把罷工看做發財的好辦法，如果遭到拒絕，「工人領袖」就率領糾察隊隨便使用暴力，甚至黨員也被毆打。⁵⁸ 這種暴力行為的犧牲者，不僅僅是外國人和所謂的中國資本家。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的報告還指出，五卅運動時期，不聽工會罷工命令的中國工人也被拉到工會，遭到威脅。⁵⁹

⁵⁷ 筆者依據的是上海日本人商業會所的報告（「上海邦人紡績工場に於ける罷業問題に関する件」1925年2月23日），和華商紗廠聯合會代表崔士傑的報告。前者轉載於《滿洲日日新聞》，後者的一部分轉載於《大阪朝日新聞》。〈在滿の工業家以て他山の石とせよ（一～五）：上海紡績罷業真相〉中的〈在滿の工業家以て他山の石とせよ（二）〉，《滿洲日日新聞》，大連，1925年3月31日-4月5日，以及〈在上海罷業事件/上海の罷工暴動/上海の罷業暴動/上海罷工事件〉中的〈支那紡績が調停に：中華重役使嗾者と会見〉，《大阪朝日新聞》，大阪，1925年2月17日-3月1日，兩則新聞都收錄於「神戸大学附属図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新聞記事文庫」：<http://www.lib.kobe-u.ac.jp/sinbun/>（2013/6/26 點閱）。

⁵⁸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139-140。

⁵⁹ 比如，「洋務公（工）會」當時被稱為「最過激派」的罷工團之一，據一個從「洋務公（工）會」回來的廚師說，該工會的成員把被外國人雇用的洋務工人拉到「洋務公（工）會」，拍他的照，要求他發誓今後絕不會受雇於外國人。如果洋務工人拒絕參加罷工，「洋務公（工）會」的成員就暗示說要毒殺他。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編，《五卅事件調查書：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2輯，頁5-6。

陸、唯一的例外——鐘紡公大紗廠的個案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試圖說明，美國與法國的歷史中存在著「歷史的其他可能性」（alternative historical possibilities），例如美國建國時期出現的 township、town hall meeting，以及在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自發組織起來的俱樂部與協會」（spontaneously formed clubs and societies）。據鄂蘭的見解，這些組織的本質是「革命帶來的微弱的自發性權力」（spontaneous feeble power organs which the revolution had brought into existence），只是在法國革命的發展以及美國建國的過程中都消失了。鄂蘭把這種政治性活動當作「革命的傳統」（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認為這是伴隨著革命的發展而「被丟失的寶物」（lost treasure）。⁶⁰那麼，我們能否同樣地從中國民眾運動史中找出「被丟失的寶物」呢？下面我們來看看公大紗廠的個案。

據滿鐵調查資料的記載，二月罷工如雪崩般擴大的時候，惟有鐘紡的公大紗廠工人「能夠完全防止局外人的煽動」。「打廠」現象逐漸蔓延時，公大紗廠的工人與家屬卻「主動表明由自己來保護工廠」，很快就結成了自衛組織。公大紗廠工人的出勤人數在二月罷工期間超過了平時，工作效率也創了新紀錄。雖然如此，五卅事件發生後，上海全市被捲入大罷工的巨浪，公大紗廠也未能倖免。6月13日，公大紗廠的工人也終於開始罷工了。⁶¹

為何惟有公大紗廠的工人在二月罷工期間，表現出與其他工人不同的態度？據蘆澤知繪的〈在華日本紡織工廠之福利設施——以內外棉上海工廠為例〉（在華紡の福利設備—内外綿上海工場の事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一文，日本有關方面，尤其是外務省，高度重視公大紗廠在二月罷工期間有效防止了罷工的現象。外務省對其進行研究之後，指出了兩個因素；第一，公大紗廠的「溫情主義」，第二，使工人留在工廠裏的公大紗廠的方針。⁶²

⁶⁰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chapter 6.

⁶¹ 高久肇編纂，〈滿鐵調查資料第52編：最近上海に於ける労働運動風潮〉，頁121-122。

⁶² 蘆澤知繪，〈在華紡の福利設備—内外綿上海工場の事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中國研究論叢》，第7號（2007年8月），頁36-38。

第一點，當時任鐘紡公司社長的武藤山治注重「溫情主義」，並將其作為經營方針，認為只有向工人提供充實的福利設施，才能使他們的生產效率提高。五卅事件發生後，外務省向中國各地的日本領事館發送文書，勸告各地日本紡織工廠採取「溫情主義」。至於第二點，蘆澤指出，公大紗廠的所有福利設施都在工廠用地內，所以工人不需要出去。公大紗廠修築了圍牆，在內部建構了工人共同體。外務省認為，正是因為有這種措施，公大紗廠才能夠有效阻斷工人與流氓的接觸。⁶³

可能會有人批評說，公大紗廠修建這樣的圍牆，目的在於監禁工人，工人在公大紗廠裏還是沒有自由。或許也會有人批評說，封閉環境下的共同體不能創造出指向民主化的公共性空間。這些批評確實有一定的道理。不過，在社會動盪，警察機構還不健全的時候，對置身於和黑社會關係密切的包工制下的工人來說，完全開放的空間不一定能保障工人個人的自由，反而容易導致「過激分子」的干涉。⁶⁴ 可能還會有人批評說「流氓」、「過激分子」的稱呼，都是帝國主義者或外國人的片面價值判斷。但是無論基於什麼樣的價值觀，也無論當初的動機如何，暴力的介入最終只是迫使對象保持沉默。⁶⁵ 與此相反，保護工人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圍牆，則可能幫助了工人的自主發言。

不過，根據蘆澤的分析，其實當時其他日本紡織公司也與公大紗廠一樣，設置了職工宿舍、澡堂、娛樂設施等福利設施。此時的日本紡織公司已在日本經歷過勞資糾紛，因此開始從合理經營的角度來考慮工人的福利問題，注重改善勞資關係，試圖防止糾紛，這些並不是公大紗廠獨有的做法。⁶⁶

那麼，公大紗廠的戰略為什麼能成功，其他的日資紡織工廠的措施為何失敗

⁶³ 蘆澤知繪，〈在華紡の福利設備—内外綿上海工場の事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頁36-38。

⁶⁴ 相關的中國工運史著作中，似乎無不談及包工制的問題。就上海的包工制與黑社會的關係而言，最值得參考的是裴宜理與韓起瀾的著作。

⁶⁵ 鄂蘭因為她自身曾被納粹德國壓迫，因而得出結論認為，當暴力介入政治的時候，真正的政治將被窒息，將完全失去走向民主主義的契機。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p. 9.

⁶⁶ 蘆澤知繪，〈在華紡の福利設備—内外綿上海工場の事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頁24-25。

了呢？雖然其背景不一，根據蘆澤的意見，公大紗廠位於偏僻地區，離其他工廠很遠，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背景。⁶⁷ 除了位置的因素以外，筆者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溝通意見委員會（意志疏通委員會）的作用。公大紗廠與其他紡織工廠的最大區別在於注重溝通。據蘆澤的研究，內外棉公司面臨與工人發生糾紛時，不是讓步就是強制。⁶⁸ 與此相反，公大紗廠讓工人推選代表，設立了由60名工人代表組成的溝通意見委員會。除此之外，公大紗廠還設置了意見箱，徵集工人的意見。⁶⁹ 換言之，與內外棉相比，公大紗廠積極進行與工人的對話。結果，公大紗廠除了近代的福利設施以外，還搭建了茶館與中國式廟宇等文化性和宗教性設施。據說，這些設施很有效地撫慰了工人的心靈。⁷⁰

其他的日本紡織公司怎樣看待公大紗廠呢？曾經研究過日本紡織公司經營史的桑原哲也，在訪問內外棉公司的前職員荒木安二時，向荒木確認了對公大紗廠的印象。桑原問：「鐘紡的上海製造絹絲（引用者註：即公大紗廠），讓中國人加入股東或董事等，（我們能不能認為）鐘紡這些做法很有效，他們成功地融入了當地。（我們）能不能看出來（鐘紡的）這些特徵呢？」。荒木的回答則較為冷淡，他說：「我不覺得鐘紡做得特別好，反而倒覺得做得不好。那是一家引起糾紛的公司」。但值得注意的是，連一直保持冷漠態度的荒木也接著說：「（鐘紡）能說。他們有說服別人的能力。不過，事實上，到底其他的公司（比我們）是否更妥當地處理了勞務管理的問題，這一點，我有意見。那家公司嗎，說得不錯（做得不一定很好）」。⁷¹

荒木的結論是，鐘紡只是通過虛偽宣傳把握了人心。但是，如果鐘紡真的只說不做，工人們何嘗會在很激烈的「打廠」風暴中，不顧危險主動組織起自衛

⁶⁷ 關於此點，筆者承蒙蘆澤知繪本人的指點。

⁶⁸ 蘆澤知繪，〈在華紡の福利設備—內外綿上海工場の事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頁39。

⁶⁹ 高久肇編纂，《滿鐵調查資料第52編：最近上海に於ける労働運動風潮》，頁121。

⁷⁰ 蘆澤知繪，〈在華紡の福利設備—內外綿上海工場の事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頁38。

⁷¹ 由於此訪談帶有很濃厚的口語色彩，為方便理解，筆者在把它翻譯成中文時，將可能被受訪者所省略的主語和其他的詞語，加置於（）內。荒木安二口述，桑原哲也訪談，蘆澤知繪校訂，〈在華紡勤務16年の回顧—荒木安二（內外綿）インタビュー—1974年8月2日〉，《近代中國研究彙報》，第34號（2012年），頁13-14。

團？筆者也許可以提出一個與荒木不同的解釋，荒木的「引起糾紛的公司」這個批評，換個角度，也可以說是組織的透明度很高、成員的氣氛很活躍。換句話說，這也許表示公大紗廠裏正開始形成人們能積極活動的空間。

當然，不可以把公大紗廠的個案理想化。如果鄂蘭看到公大紗廠的溝通意見委員會，她恐怕不太會表揚此委員會。因為她最警惕的是「代表制」（representation）。按她的理解，「代表制」總是具有走上獨裁制或者中央集權制道路的危險性。⁷² 實際上，她的警告擊中了要害，如鄧中夏指出的那樣，中國的工會常常淪為「祕書專制」。⁷³ 儘管目前筆者沒有充份的資料證明，但可以推論溝通意見委員會也發生了類似的現象。雖然與鄂蘭所說的「自發性權力」還相差甚遠，但溝通意見委員會並不是單向性的溝通路徑，而是公大紗廠和工人之間的雙向性對話機構。類似這樣能有效地徵集工人不滿與意見的機構，並且實際上也改善了工人工作環境的事例，在老百姓還不太習慣民主主義的社會中很少見。溝通意見委員會的活動範圍雖限於工廠裏，不太引起注目，但是它在現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雖然它有可能受到不少的限制，但還是可以從此種組織的活動中，發現能夠走向積極含義的「政治化」的另一種歷史的可能性。

柒、結論

首先，筆者簡要概括一下本文所探討的二月罷工的擴大過程。二月罷工大體歷經三個階段：一是面臨失業危機的工頭走向過激化的階段；二是黨的動員工作和他們的革命話語，使得失業工人的過激行為獲得正當性的階段；三是失業工人對於上工工人施加威脅和暴力的階段。本文探討的是二月罷工的內在因素，以及個人行動方式，而不是二月罷工的外在因素或大環境，因此並未涉及上海軍警以

⁷²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chapter 6.

⁷³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1930年6月19日），《鄧中夏文集》，頁458。

及北京政府對罷工工人的態度、⁷⁴ 共產國際給與中國共產黨的罷工費，⁷⁵ 以及內戰等問題。⁷⁶

其次，應該如何評估二月罷工的「政治化」呢？從二月罷工擴大過程與公大紗廠的個案中，筆者確認了兩個現象。第一，就參加者內部的主動性與被動性的比重而言，由於當時暴力被廣泛使用，因此被動參加者的比重較多。暴力可以使運動一觸即發，迅速擴大，卻難以賦予工人個體發言權。可以說，二月罷工首先吞嚥的是自衛能力低的工人。對上工工人來說，一旦被「過激」的人要求罷工，意味著這些人的矛頭首先對準的是自己。由此可見，工人「政治化」的程度主要是由其自衛能力而定的。對一般工人來說，附和在其周圍，佯裝支持罷工，其實是一種生存戰略，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人際關係與思考方式所帶來的產物。然而另一方面，被動參加者這樣的生存戰略，容易成爲培養獨裁權力的溫床。

⁷⁴ 當時上海軍警並沒有嚴格取締二月罷工的領導人。關於軍警與政府對工運的態度，據馮筱才的分析，不僅廣東革命政府，當時的執政政府（即段祺瑞政權）和軍閥的領袖們也試圖利用民氣作爲外交上的手段。換言之，這段時期，無論中央政府還是革命政府，都故意地放任民衆運動來作爲對列強施壓的手段。馮筱才，〈滬案交涉、五卅運動與一九二五年的執政政府〉，《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頁45-62。

⁷⁵ 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常常交給中國共產黨可以用來維持罷工工人生活的罷工費。關於共產國際爲發動二月罷工準備的罷工費，在當時住在上海的日本人中還有很多傳聞。其中，最具說服力的是根據「某氏」入手的共產國際「指示書」，來斷言共產國際煽動罷工工人斯的說法。參見〈上海紡績罷業的內幕：共產黨的謀計暴露〉，《時事新報》，東京，1925年3月20日、24日，收錄於「神戸大学附属図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新聞記事文庫」（2013/6/26點閱）。此則新聞所說的「某氏」應該是「岡田元」。據矢田總領事的報告，他在蘇聯海參崴以日本內務省囑託的身分活動，但是其詳情不明。矢田總領事致幣原外務省大臣的電報「第101號（極密）」（1925年3月1日發自上海），外務省編，《大正十四年支那暴動一件／五・三十事件》，第1卷（自1925年2月至6月30日），收錄於「亞洲歷史資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index.html>，Ref. B08090319600，第27-29圖像（2013/6/26點閱）。當時在上海的日本人中，還有革命黨（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通過加拉罕（L. M. Karakhan）收到50萬元資金等的傳聞。這可能也是來源於「岡田元」的報告。宇高寧，《支那労働問題》，頁494。

⁷⁶ 二月罷工是在社會動盪、江浙戰爭的影響未能完全消除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與現代社會相比，暴力更容易介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革命黨的政治話語不僅積極允許暴力的使用，而且使得暴力對象擴大了。關於江浙戰爭給上海社會帶來的影響，參見笠原十九司和Arthur Waldron等的論文及著作。笠原十九司，〈江浙戦争と上海自治運動〉，《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74年），頁117；Arthur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儘管如此，當時還是有部分工人對外部的暴力介入顯示了一些抵抗。這些是公大紗廠的工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對外抵抗，很可能是因為工人對公大紗廠擁有某種歸屬感，並且公大紗廠也向工人提供了一些保護功能。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日本人監工的虐待行為確實存在，這無疑是引起中國工人反感的重要背景之一。⁷⁷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忽略人的心理比傳統革命史所描述的還要複雜，只有在追求正義與追求利益的行為相互重合的時候，民衆才會開始積極參與某一運動。關於鄧中夏等領導人「這次罷工……是群眾自動的發動」⁷⁸ 的說法，不一定指的是所有工人的思考及行為，更可能指的是工人團體小頭目的感情與抗議，比如陶靜軒等人。

基於上述事實，筆者認為二月罷工的「政治化」在結果上缺乏對話性，因此還是走向獨裁制的「政治化」。關於此點，筆者的分析與強調共產黨的動員效果的先行研究是一致的。但是儘管如此，公大紗廠及其溝通意見委員會的例子讓我們得以探討當時是否存在過能夠表達與運動領導人話語不同思想的空間，而這種空間正是形成具有對話性的「政治化」所需要的。

與社會運動理論相反，從1930年代到冷戰時期發展起來的大眾社會理論（mass society theory），以關注出現在一般大眾的生活中的暴力為出發點，因此它比社會運動理論更能進一步意識到暴力與政治之間的問題。⁷⁹ 大眾社會論的經典

⁷⁷ 筆者並不否定男工的義憤，或者日方工廠利用作為社會弱者的女工等因素。但由於這些因素都曾在過去文獻中充分討論，比如江田憲治等的研究以及多數的中文先行研究。因此筆者省略了詳細的描述。

⁷⁸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1930年6月19日），《鄧中夏文集》，頁537。

⁷⁹ 大眾社會理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直到1950年代它在美國發展起來之前，大約有兩種類型的大眾社會理論。一是在納粹德國出現前出版的早期大眾社會理論，代表性的作者是法國歷史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西班牙學者荷西·奧德嘉·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等。在這類著作中，讀者可以發現著者對平庸而愚蠢的大眾所進行的破壞的危懼。二是納粹德國擡頭之後出版的理論，代表的作者有德國精神病學者艾瑞克·佛洛姆（Erich Fromm）、社會學者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他們的著作傾向於分析置身於孤獨、不安、無力感中的大眾，以及大眾如何轉變為產生獨裁體制的溫床。二戰以後在美國發展起來的大眾社會理論，承繼了第二類大眾社會理論的諸多洞見，試圖剖析當今美國社會的病理。參照三上俊治的整理。三上俊治，〈『大眾社會論』の系譜〉，《新聞學評論》，第35號（1986年），頁74-91。

著作之一，美國社會學者William Kornhauser的*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1959）就曾經警告說，如果某個社會不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也不允許個體成員擁有發言權，而是要求所有成員都接受唯一「正當」的看法，那麼這個社會就無法培養出民主主義，而有步入大眾社會或極權主義社會的危險。後兩種社會的共同點之一就是社會易被動員。⁸⁰ 事實上，二月罷工中的唯一例外公大紗廠，在五卅運動時期，也無法避免地被捲入大罷工之中。革命黨的介入及其所帶來的政治話語，不僅引發了暴力的使用，而且扼殺了能形成新秩序的原動力。從建構新政治秩序的角度來看，二月罷工的「政治化」與「過激化」，粉碎了也許可以培養「自治」萌芽對話平臺的發展。黨員們通過二月罷工，獲得了包括使用暴力在內的動員工人的經驗，之後試圖擴大動員。以五卅事件為契機，他們的努力最終使得五卅運動成功地發動起來。

進入21世紀之後，裴宜理好像也意識到自己過去的研究低估了中國工人運動中的暴力因素，而重新開始探索新的研究途徑了。她在2008年發表的“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文中，提示了新的方向。她一方面批評革命最後帶來的暴力混亂，另一方面試圖找出中國革命史中曇花一現的其他可能性。⁸¹ 其實這樣的方式也是鄂蘭曾經對法國革命和美國建國史的探討方式。⁸² 兩位學者都通過積極尋找歷史的「假設」，來試圖獲得批評現狀的視點。筆者基本上支持裴宜理的這次方向轉換，雖然筆者還認為，她的目光還未涉及到工人團體本身所具有的暴力因素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因此本文中，筆者將重點放在與裴宜理不同的角度上，來觀察工人運動中，不同類型的工人群體是如何被捲入到罷工之中，以及他們所具備的短暫的抵抗能力并解釋這種抵抗能力的來源。

⁸⁰ 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9).

⁸¹ 裴宜理以北伐為界，將江西省安源煤礦的工運史分成兩個階段，然後指出在蔣介石動員工人之前，安源煤礦存在某種人道精神。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揭示歷史的其他可能性（alternative historical possibilities）。Elizabeth J. Perry, “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7, No.4 (Nov. 2008), pp. 1147-1164.

⁸² 漢娜·鄂蘭雖然堅決拒絕讚揚革命帶來的後果，但還是試圖挖掘在革命過程中曇花一現的另一種可能性。她主張，這才是革命的真正的目標。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辦公室編，《上海工運史料》，1987年 3 期（1987年 5 月）。上海：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1987年。

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編，《五卅事件調查書：邦人紡織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 2 輯。上海：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1925年。

上海市檔案館編，《五卅運動》，第 1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上海市檔案館編，《五卅運動》，第 2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第 1-8 期（下）。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年。

矢田總領事致幣原外務省大臣的電報「第101號（極密）」（1925年 3 月 1 日發自上海），外務省編，《大正十四年支那暴動一件／五・三十事件》，第 1 卷（自1925年 2 月至 6 月30日），收錄於「亞洲歷史資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index.html>，Ref. B08090319600，第 27-29圖像（2013/6/26日點閱）。

高久肇編纂，《滿鐵調查資料第49編》。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5年。

高久肇編纂，《滿鐵調查資料第52編：最近上海に於ける労働運動風潮》。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6年。

張義漁等編，《上海英烈傳》，第 1 卷。上海：百家出版社，1987年。

馮天瑜主編，《湖北省誌·人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劉明達等主編，《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第 4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2002年。

二、訪談錄、回憶錄

荒木安二口述，桑原哲也訪談，蘆澤知繪校訂，〈在華紡勤務16年の回顧－荒木安二（内外綿）インタビュー－1974年 8 月 2 日〉，《近代中國研究彙

報》，第34號（2012年），頁13-14。
稻葉勝三口述，桑原哲也訪談，富澤芳亞校訂，〈在華紡勤務27年の回顧—稻葉勝三氏（豊田紡織廠）インタビュー—1974年 8月19日 頤和園（中日ビル、名古屋）にて〉，《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33號（2011年 3月），頁1-63。

三、報紙

《大阪毎日新聞》，大阪，1923年。

《大阪朝日新聞》，大阪，1925年。

《申報》，上海，1925年。

《時事新報》，東京，1925年。

《滿州日日新聞》，大連，1925年。

*除了以上報紙以外，筆者還參見「神戸大学附属図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Kobe University Library Digital Archive）的「新聞記事文庫」（Newspaper Clippings Collection）所收錄的〈新聞名不明〉的報紙。

四、專書

上海紡織工人運動史編寫組，《上海紡織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

山口梧郎，《支那常識讀本》。東京：テンセン社，1939年。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中國勞工運動史（一）民國七三年增訂版》。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年。

內藤隈南，《在支那紡績爭議》。東京：東亞社出版部，1925年。

日刊支那事情社編（本多英三郎発行編集），《長江流域の労働運動》。東京：日刊支那事情社，1927年。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宇高寧，《支那労働問題》。上海：國際文化研究會，1925年。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2014年增訂3版。
- 岡部利良，《旧中国の紡績労働研究》。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92年。
- 易江波，《近代中國城市：江湖社會糾紛解決模式 聚焦於漢口碼頭的考察》。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高島通敏，《政治学への道案内》。東京：講談社學術文庫，2012年。
-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2版。
- 傅道慧，《五卅運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 馮筱才，《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1924-19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
- 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3年。
- 鄧中夏，編者不明，《鄧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 黎 霞，《負荷人生：民國時期武漢碼頭工人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 蘇啟明，《中國現代史》。臺北：五南書局，2002年。
-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 Chesneau, Jean.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Honig, Emily.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Kornhauser, William.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1959.
- Perry, Elizabeth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 Tarrow, Sidney G..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Revised and updated 3r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Tsin, Michael Tsang-woon.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Canton 1900-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aldron, Arthur.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Paperback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五、期刊論文

- 胡春惠，〈北伐前後的民衆運動〉，收入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

- 集》，第4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 馮筱才，〈滬案交涉、五卅運動與一九二五年的執政政府〉，《歷史研究》，2004年1期。
- 三上俊治，〈『大衆社会論』の系譜〉，《新聞学評論》，第35號（1986年）。
- 中村隆英，〈五・三〇事件と在華紡〉，《近代中国研究》，第6輯（1964年）。
- 江田憲治，〈第2章 在華紡と労働運動〉，收入森時彥編，《在華紡と中国社会》。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5年。
- 蘆澤知繪，〈在華紡の福利設備—内外綿上海工場の事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中国研究論叢》，第7號（2007年8月）。
- 佐藤明子，〈五・三〇運動における中国婦人〉，《史海》，第27號（1980年）。
- 高綱博文，〈上海『在華紡』爭議と五・三〇運動——顧正紅事件をめぐって〉，收入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民国前期中国と東アジアの変動》。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1999年。
- 篠田徹，〈よみがえれ 労働運動〉，收入山口定等編，《2025年日本の構想》，頁236-261。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
- 篠田徹，〈労働運動について考える〉，《労働調査》（2009年1月）。
- 笠原十九司，〈江浙戦争と上海自治運動〉，收入野澤豊編，《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74年。
- 張建偉，〈逃避《政治化》到底在逃避什麼〉，《聯合早報》（2012年2月2日），轉引自「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2/0202/52932.html>（2013/6/20點閱）。
- Perry, Elizabeth J. "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7, No. 4 (Nov. 2008), pp. 1147-1164.
- Roux, Alain.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by Elizabeth J. Perr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1994), pp. 226-228.

